

新质生产力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陈超然 付才辉

[摘要]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这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不是几种具体的产业与特定的技术类型,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理论,旨在总结和指导下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上先进生产力是如何内生形成和不断涌现,其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在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内生成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的禀赋结构、生产结构、基础结构、上层结构的内生决定和变动机制,推进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避免“一哄而上”的“口号化”。在实践中,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协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三类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布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按照领先型产业、追赶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五类产业,分类施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一哄而上”的“泡沫化”。在学科上,应改革理论与应用相割裂的学科设置方式,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快构建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超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课程教材与报告案例研发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25)01-0001-12

DOI:10.16524/j.45-1002.20250114.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①。就像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一样,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研究”(2021MZD0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范式”(72141301)

^①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

践”^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更加强调发展的高质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制约因素仍大量存在。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1月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作了全面系统阐述;2024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是新质生产力理论最简要的概括。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机械的静态概念,更不是几种具体的产业与特定的技术类型,而是一个指导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旨在分析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上,先进生产力是如何内生形成和不断涌现的。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由资本、劳动、土地等具有第一性物质特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决定。在人类社会可用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生产结构(包括产业和技术)是由当时可变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这种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进而塑造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框架(涵盖生产、生活、科研、文化等多个领域)。这种动态过程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要素禀赋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促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终实现生产力的持续提升,这种提升如果“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②为其基本内涵,就是新质生产力。为了让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能够充分释放,需要有与之相适宜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随着物质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低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会向高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不断升级,相应地,也会不断推动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转型升级。并且,当给定的可用的科学知识所蕴含的生产力被生产结构所充分利用时,也需要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要素来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探索,为生产结构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创新可能性边界。因此,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进入生产力领域的理论桎梏,在学理上可以形成解释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上层制度结构、科研教育结构等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内生的发展、转型与运行的理论体系,丰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理论创新,理应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核心。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探索

面对时代课题,我们党历来勇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

^①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②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①。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随后,学术界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根据“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党中央提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必要性,提出要重视对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研究,如平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生产力^②。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各界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总结: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③。

1984年,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⑤。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划时代地在理论上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约束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②见平心.论生产力性质[J].学术月刊,1959(6):14-19;平心.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的二重性质的初步分析[J].学术月刊,1959(9):53-61;平心.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涵义问题及其它[J].学术月刊,1959(12):42-53;平心.四论生产力性质——给“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的作者谢昌余先生的一封信[J].学术月刊,1960(3):41-51;平心.关于生产力性质几个问题的发言[J].学术月刊,1960(4):17-36;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论生产力性质[J].学术月刊,1960(7):56-71;平心.略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八论生产力性质[J].学术月刊,1960(8):27-34.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23.

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

是改革,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①。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应地,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原创性地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学,曾一度被教育部列入与政治经济学平行的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图1),出版了一系列生产力经济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生产力经济学专业人才。1992年出版的《生产力经济学辞典》收录了达1600条目,包括总论、生产力因素、生产力特征、生产力动力、生产力环境、生产力结构、生产力规模、生产力布局、生产力时序、生产力综合优化、生产力战略和生产力方法等,议题不可谓不完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生产力经济学旋即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下日趋式微。生产力经济学不但本身未能发展成为一门主流的经济学学科,也未能对主流经济学范式产生影响。正如科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评论一样:“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②这固然有西方经济学冲击的外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生产力经济学自身内部的理论化程度不够,也并未采取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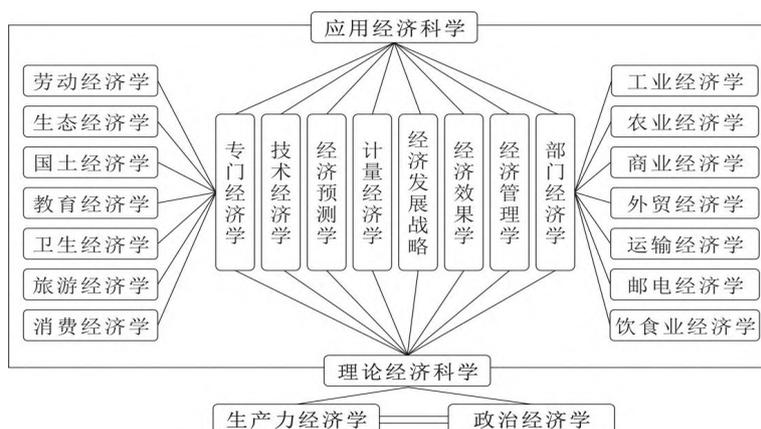


图1 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经济学学科改革示意图

资料来源:薛永应主编《生产力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13页。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③。1999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论坛》上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经过18年的艰难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新。”^④其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包括对生产力内在构成与发展重点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结构与变化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对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认识。2001年,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一文中提出创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设想^⑤,并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了系统阐述。2012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83.

②COASE 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2):72-74.

③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

④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1-7.

⑤习近平.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4-9.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就集中体现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原则、路径选择、鲜明主题、制度基础、战略举措、第一动力、主要着力点、重要法宝、重要保障、方法论等13个方面^①。总之,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原创性理论创新。

二、从禀赋结构出发,推进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整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②,但并未彻底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首要性结合起来,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是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能建立完善的“生产力是如何内生决定和客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进行成功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如果只是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进入生产力领域,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政治经济学将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经济学都在抢夺发展生产力领域的话语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占领这个领域,也就失去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指导权,最终把自己边缘化了。”^③事实上,孙冶方早就提出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④。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党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有必要按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学术体系的要求进行体系化学理化。

(一)禀赋结构是推进生产力理论体系化的出发点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创性学术范式,禀赋结构是构建生产力理论体系化的出发点。物质第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起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生产力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哲学范畴列入唯物史观始自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物质实践”范畴序列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正式使用生产力概念^⑤。据苏联学者巴加图里亚的考证^⑥,恩格斯是在1843年11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开始使用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至1844年初在李斯特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录中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1845年马克思写作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才是“真正离太阳最近的文本”^⑧。在马克思的哲学观不断发生激变并最终实现格式塔式转换,这一关键时期的一组文本群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月)、《神圣家族》(1844年9月)、《评李斯特》(1845年3月)、《关于费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13-170.

②1859年1月马克思为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序言是一篇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原理进行高度概括的经典文章,也是马克思首次从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精辟阐述。

③逢锦聚,洪银兴,林岗,等.政治经济学:第6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6.

④孙冶方.序——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M]//平心.论生产力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9-22.

⑤杨乔喻.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J].哲学动态,2013(8):33-37.

⑥巴加图里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生产力”范畴[J].李树柏,译.哲学译丛,1982(2):1-8.

⑦熊映梧.生产力经济概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6-30.

⑧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16.

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在这一文本链中,《评李斯特》的出现,填补了在《神圣家族》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的一个重要文本缺环,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①。

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用10章内容考察了9个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之后,在该书第二部分第12章便旗帜鲜明地将标题设置为“生产能力理论和价值理论”,以便与斯密之后由李嘉图等继承发扬的价值理论划清界限。李斯特对斯密也予以了深刻的批判^②。然而,正如有学者在回应所谓“李斯特经济学”^③以及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论题时所明确指出的,“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石——生产力理论缺乏唯物论基础,也没有建构一个核心的“生产力”范畴,还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混为一谈;“李斯特经济学”没有一个标准的分析性范式、框架和纲领,其理论体系实质是由几个政策信条构成,缺乏严谨的理论支撑,甚至有为工业资产阶级辩护的成分。因此,与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不如说李斯特的追随者低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④。可以说,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的直接产物,即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不但脱离历史客观结果,而且更脱离生产关系,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生产力理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生产力理论曾经给我国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按照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即生产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既得的物质力量,人们不能主观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是前人实践活动创造的客观结果,是当前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⑤——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禀赋结构。生产力具有历史性,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把生产力的发展分为若干阶段。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孤立地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阶段的区分和发展,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⑥。生产关系的变更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决定的。事实上,马克思在阐述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巨著《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所总结的“历史即禀赋”是非常清楚的:其一,资本主义生

①张雪魁.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J].社会科学研究,2006(3):7-11.

②李斯特认为,斯密将他的名著命名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经济学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在这里所表示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国家经济同私人个体经济一样,是应当在这种双重观点下来考察的。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拥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生产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产品,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有那份生产力,可以生产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如斯密具有这样拥有明彻理解力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不理睬财富与财富原因之间的差别以及这些不同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在他那部书的导言里,他曾明确指出:“劳动是一切国家获得财富的支柱,而财富的增加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能力,即一切国家的劳动力的熟练、精巧和判断力的程度。其次,它还取决于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比例。”由此可见,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但是,使完整的科学端端正正地从个别思想家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看来并不是造物主的计划。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的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劳动分工”迷惑住了,因此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论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似乎认为“劳动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打算靠这一点使他的著作问世以后能轰动一时,以为后世所景仰。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01-102.

③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J].南方经济,2018(1):5-35.

④高岭,卢获.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吗?——“李斯特经济学”的再评价[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207-224.

⑤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59.

⑥盘森.三个标准的辩证统一[J].理论与当代,2000(5):4-6.

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其二,与其他任何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相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得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其三,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生产关系的正反两面;其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物资产品,还不断生产出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不断地生产出相适应的分配关系^①。

作为产业政策之父,李斯特对于经济学界来讲并不陌生,但是为何李斯特的主张在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取得了成功,却给其他的后发追赶国家带来了灾难,这对缺乏唯物史观的经济学来讲是一个谜题^②。但对于新结构经济学而言,答案却一目了然,即只有遵循由当时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客观约束条件的产业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将适得其反,过犹不及。因此,马克思所批判的“李斯特经济学”提出的经济发展政策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生产力理论,并没有从物质第一性出发,其主张的产业政策仅仅在当时与世界发展前沿的英国、美国物质禀赋条件差别不大的德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的实践中取得成功,而在与世界发展前沿国家物质禀赋条件差别较大的苏联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失败。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时^③,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美国的35%,由于要素禀赋物质条件不具备以及与美国进行军事竞赛,整个经济基础缺乏自生能力^④而不断被瓦解,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理化阐释

从禀赋结构出发,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入的学理化阐释。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基础上^⑤,笔者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简称NSE),是一门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和创新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从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来研究经济发展、转型与运行的经济理论体系^⑥。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体现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范式。其中,“一个中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是新结构经济学认识世界的起点,反映和创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三个基本点”中第一个基本点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各种结构的内生性(the endogenous structure),即生产结构(指产业结构及每个产业所用技术的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基础设施结构与上层建筑结构(包括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科研结构、空间结构、开放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等)内生于生产结构,也就是发展的本质——一个经济体如何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第二个基本点是扭曲的内生性(the endogenous distortion),即扭曲是内生于不同层次结构变迁的难易和速度的不同或由于政府的干预等导致对内生产适宜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偏离,也就是改革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3-1000.

②LIN J Y F, MONGA C.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rowth[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3): 264-290.

③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90.

④LIN J Y F, TAN G F.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2): 426-431.

⑤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7.

⑥林毅夫.中国的发展奇迹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J].经济学(季刊),2024(6):1719-1728.

本质——如何消除扭曲变成一个各种结构环环相扣都没有扭曲的状态;第三个基本点是经济运行的内生性(the endogenous operation),即由于结构和扭曲的内生性,经济运行的规律也呈现内生性,也就是运行的本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具有第一性;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相对于生产关系,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生产力则由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产业所使用的技术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产业所用的技术则内生决定于该经济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具有“第一性物质”的地位。新结构经济学从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具有第一性物质特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理论体系的原点,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内生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并由生产结构来内生基础设施结构和金融、财政、货币、教育、科研等属于上层结构的制度安排,同时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现代经济学学术范式。因此,在内生生产力的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新质生产力理论不是一个机械性描述什么类型的产业、什么类型的技术是不是新质生产力的静态理论,而是一个新质生产力是如何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内生形成的动态理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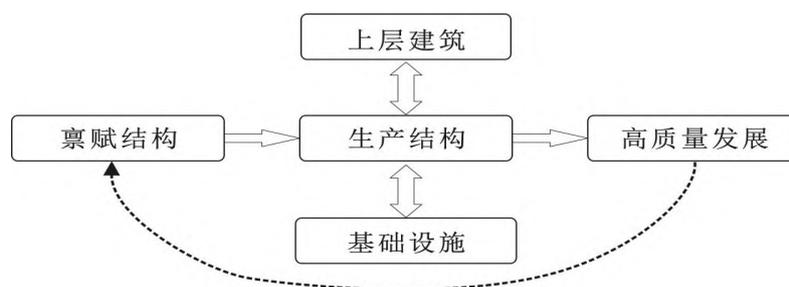


图2 新质生产力内生形成机制的新结构经济学动态理论框架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背后的生成机理由反映在每个时点给定的人类社会可用的科学知识,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代给定、随时间可变,具有第一性物质特性,生产、生活、科研等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即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组成的生产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宜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结构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向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不断升级所形成的。因此,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技术不断突破进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①。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理有新质的禀赋结构、新质的生产结构、新质的基础设施、新质的上层建筑结构和新质的科学知识结构等五个新结构内涵。其中,新质的禀赋结构(特别是新质的要素积累所推动的禀赋结构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动因,即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教育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的生产结构是新质生产力的表象,即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生产力质态;新质的基础设施与新质的上层建筑结构是消除发展新质生产结构的瓶颈与制约,使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条件;新质的科学知识结构是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的公共财富,其研发需要大

^①马强,张继慧.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生产力研究,2024(9):7-12.

量的资本投入,且具有极高的风险,在发展早期,随着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推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内涵了现有科学知识的设备和技术,随着其产业和技术接近世界前沿,则需要投入资源来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为技术研发、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提供新的可能边界。与此同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禀赋结构的升级,最优的生产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各种不适宜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就会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的结构扭曲,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但制约因素仍然存在,要重点深化人才、科技、教育、金融体制等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新质生产要素活力,在新质生产力布局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总之,理论上要深入研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禀赋结构、新质生产结构、新质基础设施、新质上层建筑结构、新质科学知识结构的内生形成机制和动态变迁规律,推进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并在高质量发展中开展实践,避免“一哄而上”的“口号化”空洞解读,“泡沫化”成果反而会造成一种空洞化而没有理论创新的负面印象,刻舟求剑的错误解读甚至还会误导实践。

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按照《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到2035年要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2020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刚超过100万亿,“两个翻一番”的目标相当于再造一个100万亿的中国经济,这要求2020—2035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73%。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新发展阶段,按照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形成新质的禀赋结构、新质的生产结构、新质的基础设施、新质的上层建筑结构和新质的教育科研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持续按照新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推动结构升级,才能最快提升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因地制宜,否则适得其反。回顾过往,正是在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实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定下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奠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的物质禀赋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物质资本短缺的面貌得到改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产业技术得到积累,自然生态得到修复,人力资本丰裕,形成了超大市场规模,要充分发挥这些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一些流行观点认为,只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才是新质生产力,将发展安全、科技自立自强与通过深化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立起来,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改革新型生产关系割裂,将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不管自身有没有物质禀赋条件,都可以大搞新质生产力,等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从前面的学理化分析可知,新质生产力是由禀赋条件内生形成的,禀赋结构具有多样性,因而新质生产力也具有多样性。形成生产力的具体产业与技术需要具体的禀赋条件,必须与生产者具有

的禀赋条件相互匹配,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搞“一刀切”“一哄而上”就是泡沫化,适得其反。不仅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也要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合理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关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们应抢抓机遇,加强创新力度,培育与壮大新兴产业,并以超前布局加速发展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①。然而,发展新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各地需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展。根据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等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的发展,并合理使用新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②。

按产业出现的时间轴分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指导各行业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前瞻引导性,但政策落地容易偏误,尤其是地方层面,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禀赋条件与发展阶段各异以及产业多样性较大,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可能正好是欠发达地区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且传统优势产业往往是我国在国际上的领先型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有传统产业的许多产品作为中间部件为其配套,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等引领世界的新兴产业在我国的涌现就是一个例证。各地区可以按照各自与国际国内发展前沿的距离以及形成具体类型新质生产力的周期,将各自的产业分为领先型产业、追赶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五类^③,针对不同产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和面临的不同制约因素,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从而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水平,甚至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产业,这些“领先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自主创新。而在一些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短研发周期“换道超车型产业”,我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具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比较优势,可以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也有一些关系国防和经济安全的长研发周期“战略型产业”,我国需要依靠自主创新来推动其发展。此外,对于那些现阶段仍处于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的“追赶型产业”,或者失去比较优势而需要把产业转移出去的“转进型产业”,则需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虑各种因势利导政策对这些不同类型产业在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随着我国诸多领域进入世界前沿,要加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可能性边界。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也是拓展新质生产力可能性边界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更需要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经济社会思想条件。

四、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快构建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禀赋条件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关系的辩证统一。禀赋条件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生产力提升物质禀赋;新的禀赋条件内生形成新的生产力,改变新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经济基础,变革新的上层建筑。如此循

^①宋静思,刘书文,田先进.不折不扣抓落实[N].人民日报,2024-03-11(6).

^②赵丽梅,赵安琪.新质生产力,乘势而上[N].中国青年报,2024-03-07(6).

^③LIN J Y F.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7(1): 5-18.

环往复,发展永无止境。随着发展程度越高,不但整个社会形态结构越来越复杂,而且经济体系各个子系统也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反作用越来越大。例如,当今我国的教育系统、科研体系、金融系统、环境系统、空间系统、制度系统等都是全世界最庞杂的,各个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巨大的。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运用辩证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①。因此,新质生产力理论应该发展为一个完整闭环的动态理论体系,且须学科化建设,才能深化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化。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新结构金融学对此进行了广泛探索^②,其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在融资规模、风险和信 息等方面存在结构差异,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结构随实体经济的结构差异而有系统性不同,相应的金融市场运行特点和金融创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实体经济存在结构扭曲,也必然导致相应的金融结构扭曲;扭曲的金融结构不但会抑制产业与技术的生产力,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影响金融市场运行,还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给经济体系的其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因此需要全面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来解放新质生产力。

总的来讲,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快构建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既可以打破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垄断地位,也可以推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从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纯消费的理论,从消费看待生产、交换与分配,联系生产力研究资源配置,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新制度经济学本质上是纯交易的理论,从交易看待生产、分配与消费,联系生产力(现已经脱离生产力)研究社会性交易的合同与制度关系;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分配的理论,从分配看待生产、交换与消费,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运动,即剩余价值问题;而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生产的理论,从生产看待交换、分配与消费,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性物质的要素禀赋出发来研究生产力及其对应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关系,真正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把生产力内生 化,进而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内生 化,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未完全内生 生产力。新结构经济学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内生 生产力的理论体系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付才辉与方兴起商榷中所指出的^{③④},尽管方兴起误解了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联系,但其提出的警示却值得警惕:不能利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取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否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就只是一个标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从“后门”进入新结构经济学,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

从学科建设来看,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快构建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时机已经成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 1997 年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一文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实现了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因此,不能再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生产力经济学学科建设那样,将生产力经济学与侧重于生产关系的政治经

①胡少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扎实做好审计工作[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4(2):14-18.

②林毅夫,徐佳君,杨子荣,等.新结构金融学的学科内涵与分析框架[J].经济学(季刊),2023(5):1653-1667.

③付才辉.简析马克思主义与新结构经济学——兼与方兴起和高冠中商榷[J].当代经济研究,2020(11):63-72.

④方兴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新结构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2020(6):63-72.

⑤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1-7.

济学相并列,而是辩证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可以通过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割裂的学科设置方式予以改革,加快构建新结构生产力经济学。

[责任编辑:刘曙华]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Lin Yifu, Chen Chaoran, Fu Caihui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dentified the central task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imary tas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 new theories of productive forces for guida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ssential task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not a static concept, nor are they specific industries or types of technologies. Instead, they represent a dynamic theory designed to explain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how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re endogenously formed and continuously emerge on the new journey of applying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fos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new theory upholds and develop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present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ory, it is imperative to conduct in-depth study on the endogenous decisive factors and changing mechanism of the continuously emerging endowment structure, production structure,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 as the results of endogenousl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adv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will promote the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void being brought about in a rush and sloganeering. In practice, it is imperative to firmly focus on the primary tas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make overall plans and coordinate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by implementing category-based policies and giving judicious guidance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five types of industries such as leading-edge industries, catching-up indus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losing industries, short innovation cycle industri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prevent a headlong rush into project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 bubbles. In term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pattern of discipline setting that isolates theory from applic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tructural productive force economi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ew structural productive force economics